

上年纪了，有事无事便闪过往的琐琐碎碎。前几日高考，勾起了我上大学的悠悠旧事。

那时大学也争生源，但很文明很温馨。高考前夕，复旦大学组织我们去参观校园。用校车接了去，还招待一顿快餐。记得一大捧油汪汪的肉包菜包，配一碗可口的蛋花汤。今天学生自然不屑一瞥的，可是在饥饿笼罩的“困难时期”，每月只供应二十九斤粮食四两油，买鱼买肉买鸡蛋全凭票证的年代，你掂量吧。复旦校园之大令上海弄堂中学的学生们咋舌，比这更大的惊喜是，时任复旦校长的大数学家苏步青给我们作了个报考复旦的动员报告。说是报告，时间毫不冗长，结束时很不过瘾。回来路上，大家纷纷立志来这里上学，我也暗自铁了心。

填报志愿那天，纵然班主任鼓动我第一志愿与北大，我却丝毫不为所动。岂料交表后插进一位语文教研组长彭老师，他有感历届毕业生落榜北大文科，决心实现零的突

身体矫捷之外

陆其国 不知不觉我在上海老龄大学“写作与美文欣赏”班授课已进入第六个年头。其间不乏一些学员由于家事、健康、去国或其他原因离校；然而每学期也不断有新学员报名进校。总之是离开的少，报名进来的多，以致后来不得不从原先的小教室，迁至稍大些的教室。

如果把这样的情状说成是铁打的班级流水的学员，或许失之夸张；但说每位离校学员有离开的理由，每位新入校学员有新来的期盼，这应该不会错。比如有学员曾经以为，我讲写作，应该会从基础知识讲起，结果却并不是这样。而在我看来，和中老年学员写作，应从基础知识起步，确实有些难。这样教学写作，且不说于“老年教育”是否合适，以及我是否能够胜任，首先就会让我（包括相当部分学员）感到兴味索然。这不，我很快发现，报名进入这个班级的中老年学员，大都拥有着较高的文化基础，有的就是知识分子，他们或毕业于名牌大学，或从大学、中学教师、医生岗位上退休……为了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有别样的精彩，他们欣然来到老龄大学“充电”。毕竟他们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，这也是他们拥有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。

对于中老年学员来说，如何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用文字表达出来，早已超越一般技术性写作层面，我认为这正是向中老年学员讲写作，和在中小学课堂教作文不同的地方。其中关键就在于，中老年学员有着丰富的阅历、经验和知识；而这些对于中小学员来说是一个薄弱点。前者的阅历中，当然也包括他们对纸质书籍的阅读经历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学习铺垫（或称基础），才使我主讲的“写作与美文欣赏”课中的“美文欣赏”得以落到实地。我深信，要读懂并学会欣赏我们在讲课实践中所选取的一些美文，如没有相应的阅历和经验，显然无从想象，更不会由此影响并提升中老年学员的写作水准。

事实上在这些年的讲学实践中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，就是我和中老年学员们不仅彼此能够愉快讨论和对话，而且他们的阅读和写作水准，都在不断提高。尤其是我们都非常清楚，如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大量读物，哪些真正值得花时间精力认真一读；哪些泛泛浏览即可；哪些根本就不可不看一顾……有了阅读的鉴别和提升，这才有什么谓写作的真切认知，从而在实践中得到提高。这些年来，学员们不断写出作品，就是最鲜明的写照。且不论他们的文章水准高低如何，至少他们知道，写作时的立意与思考，与写出真正的“美文”有着怎样的关系。作为主讲者，我觉得一个人明白这一点，远比掌握单纯的写作技巧重要得多。另外在他们的手机朋友圈，你很少会读到或内容空泛、或蛊惑人心的“心灵鸡汤”和观点偏激的文字，这就是他们知性和智慧的显现。

破，竟然代我复旦且为北大。木已成舟才告诉我一声，急得我双脚直跳，连呼“完了完了！”

世间总有出乎意料的事，北大录取通知书寄到，伴随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，并附有几张行李标签——那时都自备行李上学，行李集体托运。我自己惊喜不言而喻，彭

那年我上大学

陈老萌

老师的高兴尤甚于我。我寄居叔叔家，他逢人便告，孙子考上了北京大学。人家问，是北京的什么大学？他一脸茫然，答不出什么大学。

由沪赴京入学，铁路局组织了新生专列，记得是27小时行程的加班车，得一天两夜。行前家里欢声笑语，忙了丰盛午饭。但朵颐之快驱散不了心里疚意，胞兄从数百里外赶来送行，却未得与席，替我在北火车站候车广场看守一堆随身的七七八

八，饭盒、脸盆、热水瓶，冷清清地枯坐几个小时。第三天夜间到了首都，学校一辆大巴早早候在北京站外。司机体贴我们心情，特意途经长安街，过天安门前特意开得很慢。大家目不转睛凝视昏黄夜灯下的城楼，朦胧中愈发感到庄严。学校食堂破例不待天亮开饭，早餐牌标示“金银粥”，以为接风晚餐，端的竟是玉米糊糊里撒了可数的米粒。每年暑假探亲返校都是坐加班列车，经南京过江，还需火车摆渡到对岸浦口。有一年河北洪灾，列车堵在山东，改道往烟台，易海航轮船抵塘沽，转京津线到学校，是我人生难忘的一次特别旅行。

打住流水账。所以记下今日学生难以想象的诸多细枝末节，或可为那个年代立以存照，他们是否会从中品味出些什么。前些年我有幸应邀参加研究生答辩，一晃数十个冬夏，再次踏入复旦校园，不胜唏嘘。如果当年能报考考取倾心向往的复旦，或许也不会冥冥中与她失之交臂。



多梦时节（水彩画）史涛

时光飞逝，儿子下个月就要大学毕业了。回顾与儿相处的二十多年里，在教育他的同时，他也在教育影响着我这个父亲。许多事情，我以儿为镜，正言行，守规矩，坚守人生的高地，保持灵魂的干净。

印象甚深一事，儿子上初二时感冒发烧，我带他上医院看病。看完病后，一起去药房取药。医院引进了先进的配药系统，按审核先后顺序依次分拣，电脑自动呼叫取药人姓名。那天那87名，看来一时是走不了。恰巧这天单位有事等着我回去处理，心里好是着急。向取药窗口一瞧，发现正好有熟人在值班，不由眼睛一亮，有如发现了新大陆，何不请她打个招呼，优先照顾一下呢？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真不好意思张口，儿子也认识她，我就让儿子去说说。“不行！这么多人都能等，不能搞特殊。”儿子断然拒绝了我，我只好继续焦急等候。可半个小时后，儿子的名字才排到第20名，我又催儿子去找熟人，看能否提前取药。他依旧摇头，还对我说：“爸，你的事能不能先放放，大家都在排队，我们要插队，其他人会有意见的。”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候。

今天外卖的普及和繁荣，得益于互联网和手机的发展普及。但是，饭店酒家打包外卖，古代就有。

据史书记载，宋朝城市的餐饮业十分发达。“处处开门，各有茶坊酒店，勾肆饮食。市井经纪之家，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，不置家蔬”，这就是说，宋代都市不少市井人家，跟今日白领一样，不习惯在家做饭，喜欢下馆子或叫外卖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、吴自牧《梦粱录》等史料笔记所写“逐时施行索唤”、“咄嗟可办”，即是证明。这就是说，宋朝一般城

市皆可随时叫外卖，至于如何“索唤”，则不能做到像今天那样足不出户。宋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是一张国宝级名画，也是一张宋代的“美食图”，一张吃喝的风情图。画中的100余栋房屋，餐饮业店铺接近半数。其中也隐藏着几个有趣的细节。放大了看，就是当时外卖小哥的送餐服务。一个镜头是：一家脚店（类似今天的大排档）前，一个店小二，正端着两只碗，出门送外卖。送的可能是近处，端着碗就走，脚步匆匆；另一个镜头则不同，那位送外卖的伙计头上顶着一个大盘，上面叠着两三盒食品，另一只手还拿了一个可以开合的支架，正步履稳健地行走，他可能是送较远的外卖，头顶上有几个食盒，所以不敢走得太快。

有意思的是，宋代皇帝也叫外卖。据《辛癸杂识》记载，宋孝宗是一位资深的美食家兼“外卖爱好者”。他可能是宫廷菜吃腻了，不时叫点民间外卖换换口味。据史载，他曾派人到市场上“宣索”李婆

又过去了20分钟，儿子的名字还排在16名，单位同事一再催我回去，再不能耗下去了，我向前走了一步，想去窗口给熟人打招呼。陡然，几乎所有等候取药的人的目光投向了儿子，如芒刺在背。还听见有人小声嘀咕：我们都有急事，可能插队啊！听到这，我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，不敢向前迈了。回头一看，儿子正拉住我的衣服，我只好转身坐下。

如同片名，爱尔兰影片《教授与疯子》，出现了双男主角：教授詹姆斯·默里和疯子威廉·迈纳，前者由梅尔·吉布森扮演，后者由西恩·潘饰演。这两个人

的生活，注定要奇怪、紧密地纠缠在一起，而且，注定要与《牛津英语词典》纠缠在一起。导演法尔哈德·撒夫尼亚把英国19世纪一段史实，以一种揭秘方式展现出来：一部史上最著名、最具开创性的《牛津英语词典》，其中一部分内容，竟然由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提供和撰写。词典主编爱尔兰人默里，不是科班出身，14岁退学谋生，来到英国，没有大学文凭。他不仅精通拉丁语、希腊语，还熟悉意大利语等十几种语言，以及普罗旺斯语等地方方言，甚至专攻古代英语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反对墨守成规。

默里创造的词典编撰方法独具一格，与其他词典不同，他力主严格依靠收集大量英语出版物及其他记载中的引语，来说明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。引语能确定词语的起源和变化。如果一个人做这件事，要一百辈子才能做成，那么，动员一千人，动员所有使用英语的人，去阅读、去寻找、去摘录，最多七年就可完成。默里豪迈地说：“我们将开启一场语言学最伟大的冒险。”

“文字在千古岁月中，斗折蛇行，迂回前进，它们的意思历经沧海桑田，不断给自己增减微妙细小的差别，但在浩瀚的英语文学中，它们留下了车辙马迹，对每一个单词，我们必须追本溯源。”默里极富激情和诗意的征稿信，被精神病患者、美国人迈纳看到。南北战争期间，作为陆军上尉、外科医生的迈纳，受命用火红的烙铁在逃兵脸上烙印而受刺激，退伍后来英国，因幻听、妄想，错杀无辜的人，被监禁在刑事精神病院。他从前是耶鲁大学毕业生，饱读诗书。电影里有两个人的对比场景：当教授在接受编词典工作面试时，疯子正从床上跳上跳下，声称有人要害他；画面外音传来教授征稿信的内容，画面里是疯子在书籍里寻找、摘抄，还有挂满墙壁、堆积地上

杂菜羹、贺四酪面、臧三猪胰胡饼、戈家甜食等外卖，用来招待上等宾客。吃得开心，宋孝宗还给赏钱。“直（值）一贯者，稿之贯”，只值一贯钱的吃食，加倍给二贯的赏钱。买者和卖者，皆大欢喜。

古代需要叫外卖者，不像今天能通过手机点餐，往往是通过家丁采买、上门叫卖、约定送餐三种方式。“逐时施行索唤”，饭馆差专人送上门，也是货到付款。如是常客，餐具和食盒都能留在府上过夜，第二天伙计再来拿。明代《喻世明言》还记述了当时

另一种叫外卖的步骤：“宋四公便叫将店小二来说道：‘店二哥，我如今要行。’”“二百钱在这里，烦你买一百钱爇肉，多讨椒盐，买五十钱蒸饼，剩五十钱，与你买碗酒吃。”这里的“外卖”，是代买的意思。

古代的送外卖者，不叫外卖小哥，而称之为“闲汉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曰，更有百姓入酒肆，见子弟少年辈饮酒，近前小心供过，使令买物，取送钱物之类，谓之闲汉。“闲汉”一语，反映出当时送外卖没有专职人员，饭店生意忙了，找几个“闲汉”来顶差，

完成的纸片；当教授因一些词语陷入困境和压力时，疯子一千个单词和它们在古籍和经典文学中引语的成果，就已经寄送过来。“这绝对是个奇迹。”默里的助手惊喜地说。

两人的见面要等到电影过半，默里绝不在乎迈纳的身份，两个大胡子，头发都渐渐发白，谈书籍、对词语，一见如故。两人通着信。默里说：“你可能无法想象你援助的有力和及时性。”迈纳说：“我已经太久沉浸在黑暗中了，谢谢你接过了我的火炬，我将携手传递光明，直至再无黑暗。”

如果说，梅尔·吉布森以儒雅、敦厚、宽宏塑造教授，那么，西恩·潘留给我们又一个出色的疯子形象：清醒时温柔、发疯时狂暴、撰写词典时忘我、被残酷治疗时无助……尤其和其谋杀者妻子米莉特的交往，他悔恨、自责、赎罪，在米莉特渐渐忘记仇恨，喜欢并爱上他以后，他对自己的憎恨无以复加：“我从死者那里偷走了她。”该爱、不该爱，纠结引发他再一次发疯，导致他自戕。

默里编撰词典也非一帆风顺，有人因他不遵守传统，打乱了固有的体系而耿耿于怀，用漏词、差错，甚至用重用“杀人犯”玷污词典的罪名，将他摒弃于门外。默里的妻子，在默里缺席的会议上慷慨陈词：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刚好有两个人找到了彼此，我丈夫和他那疯狂的杀人犯朋友，他们一起，给了我们伟大非凡的东西，人性不该被惩罚。”

影片最震惊的一幕：当迈纳再一次面临法庭的判决，默里勇闯大臣办公室，呼吁尊重迈纳的生命。大臣说：“你的词典，为我们提供了掩盖一切不愉快的方法，我能做的是，就是将迈纳驱逐出境。”迈纳于1920年去世。默里继续编词典，以字母T完成了自己的工作，1915年离世。留有教授和疯子印迹的这本词典，带着他们不一般的友谊，仍在流传，而12卷的《牛津英语词典》全部完成，要等到1928年，此时，离开首次构思编写，已经过去70年了。

与今天的快递小哥开助动车飞车走巷相比，可谓是一个天上、一个地下。

清代的叫外卖服务周到，旅客在游船中，也可享受外送美食。据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：“野食谓之饷。画舫多食于野，有流觞、留饮、醉白园、韩园、青莲社、留步、听箫馆、苏式小饮、郭汉章馆诸肆，而西城游人又多居于城内肆中预订者，谓之订菜，每晚则于堤上分送各船。”游人游到哪里，各餐馆晚上根据订餐，趁游船靠堤时，准时送来外卖，游客可以尽兴享用当地美味，也是一乐。

守规矩，他会批评我们。路上看见乱扔的垃圾，他主动拾进垃圾桶。因怕他上学迟到，我总是劝他快点走，等会儿有环卫工来清扫。他却不同意，都这样认为，路上不全脏了，依然要干完才会走。

儿子上大学后，长成了大小伙儿，可他依然保持过去的品性，严守校规校纪，乐善好施，积极向上，很快当上学生会干部。他大二转系时，我托当地的朋友找台车给他拉行李去新校区，他见其他转系的同学行李多，硬是请我朋友帮忙，将其他几个同学的行李全都运过去。这种乐于助人、助人的精神，不仅让同学称赞，更让我十分欣慰。如今，大家都感叹人与人之间冷漠，这时最需要一颗心去温暖另一颗心，世间才会处处有温暖。

我们做父母的，在教育孩子时，不能事事高高在上，以家长的口吻去说教，许多时候，孩子真的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们的善良、他们的品行、他们的处世观深深地教育我们，影响我们。以儿为镜，获益无穷。

外孙很喜欢那块捡到的石头，但离开前还是将它放回了原处。

教授与疯子

刘伟蓉



读碟

儿子的人生高地

李根萍

又过了10分钟，终于听到呼叫儿子的名字。我和他在窗口取药时，熟人惊讶地笑着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怎么不提前找我？”我说：“没什么事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就不麻烦你了。”儿子听后露出敬佩的目光，满意地对我笑了笑。我庆幸自己终究没搞特殊，保持了父亲的形象。儿子自从懂事起，诚实有礼，见人就打招呼，老师教的东西，严格遵守，从不搞变通。走路遇上红灯，即使没有汽车通过，他也会耐心等待绿灯亮后再走。我们有时过马路不